

鲁南作家论

LUNAI
ZUOJIA
LUN

董业明 等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教育厅教学改革试点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课题

LUNAN ZUOJIA LUN
鲁南作家论

著者 董业明 张伯存 王桂青
曹新伟 赵秀媛 顾 玮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南作家论/董业明等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81067-576-1

I. 鲁… II. 董…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山东省 IV. I209.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419 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266003)

出版人:王曙光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14.75 字数:3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00 定价:28.00 元

目 录

导论·····	(1)
新文学的先驱	
——王思玷论·····	(23)
游子的文化乡愁	
——王鼎钧论·····	(37)
政治文化的时代回声	
——贺敬之论·····	(151)
多维的现实主义空间	
——毕四海论·····	(229)
蘸着泥巴写乡亲	
——张继论·····	(295)
淳朴的泥土气息 沉郁的感伤情调	
——王思玷《偏枯》赏析·····	(307)
中国“黄昏文化”的“遗传密码”	
——王鼎钧《迷眼流金》赏析·····	(312)
碎琉璃里的母爱光辉	
——王鼎钧《一方阳光》赏析·····	(318)
“延安情结”的深情演绎	
——贺敬之《回延安》赏析·····	(326)
笔挟风雷的政治抒情	
——贺敬之《雷锋之歌》赏析·····	(332)
对“人性化的政治与政治化的人性”的批判	

——评毕四海的政治小说《选举》·····	(339)
现代文化撞击下的新生之路	
——评张继长篇小说《去城市受苦吧》·····	(350)
到纽约,走访捕蝶人王鼎钧先生	
——王鼎钧访谈·····	(361)
鲜红的诗歌:永远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贺敬之访谈录·····	(375)
文明·人性·科学	
——毕四海访谈·····	(389)
我愿是文学田野里的一棵茁壮的玉米	
——张继创作谈·····	(398)
王鼎钧研究资料·····	(427)
贺敬之研究资料·····	(430)
毕四海研究资料·····	(435)
张继研究资料·····	(452)
后记·····	(465)
参考文献·····	(466)

导 论

鲁南这块沃土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代代勤劳、善良的鲁南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这一方水土滋养培育了无数仁人才俊：墨子、孟子、荀子、孟尝君、匡衡……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鲁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学艺术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成绩斐然、名扬全国乃至海外的作家。他们中既有孜孜于现实主义道路的探求者，又有先锋实验的现代派；既有把文学的根深深地扎在这方土地里原汁原味表现生活的辛勤耕耘者，又有海外游子念兹在兹献上心香一瓣的斩不断的文化乡愁者；既有下笔洋洋洒洒的小说家，也有用如椽巨笔描绘波澜人生和心灵的散文家，还有感情洋溢、笔挟风雷的抒情诗人。可以说，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艺术表现以及文体上，鲁南文学都表现出了多元性、丰富性，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王思玷这位鲁南之子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和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先驱者同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作家。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著名的评论家茅盾就对他有过高度的评价。读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的人也许还会记得茅盾在这篇著名的导言中用了千言的篇幅对王思玷的 7 篇小说一一作了鉴赏性的评述，认为它们“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使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

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画面”,然后怀着深深的遗憾慨叹他“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虽然“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值得我们再提起了”,“他们在那时候,自然是所谓‘无名作家’。他们的身世,我们不大了解,只知道……王思玷大概是山东人(我记得他的稿子都是从枣庄寄的)……”80年代不少的文学史、小说史、文学辞典、文学作品选中对他也均有涉及。我们从他所留下的小说中,就可看到这位锋芒初露的作家的才华和实力。

王思玷,1895年生于山东省枣庄兰陵镇西南圩(历史上曾属丞县、峄县、琅琊道临沂县)。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以“风雨之下”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立即响应,写下了处女作《风雨之下》。小说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上发表,被评为入选的优秀作品。此后,他又连续写了6篇小说,均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来不缺乏感时忧国的情怀。这当然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王思玷的小说无一例外地打上了时代的鲜明印记。王思玷创作之初正是“为人生”派小说崛起之时,他虽然不是“为人生”派的作家,但创作伊始就自觉地担当起了“为人生”的责任,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给予了很大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而不应该被忘记的作者还有王思玷,他短暂的一生大概只写过7篇小说,均发表在1921年至1924年的《小说月报》上,其中5篇是描写农村题材。……而且他又早于王统照把山东血与泪的生活呈献给文坛。”

从王思玷的7篇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参与意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20年代初期,当很多作家都在热中于描写爱情婚姻等题材内容时,作为一个非“为人

生”派作家，他却比“为人生”派作家先行一步，紧随鲁迅等新文学先驱，执著地关注现实人生，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现状，提出了很多农民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天灾人祸以及现实黑暗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威胁和影响，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了新鲜、真切、朴实的空气，郑振铎在《血和泪的文学》中对王思玷的小说也给予了肯定：“可以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几乎没有这种描写被压迫者的血和泪的创作，惟有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上发表过几篇并未加入该会的作者的创作，如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王思玷的《偏枯》……”所以，称王思玷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如此，他的小说还经常闪耀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他对农民性格中的善良、美好的东西给予了很大的欣赏和认同，他怀着极大的人文关怀描写他们的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对社会的罪恶势力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他对当时给民众造成严重影响的军阀战争也非常关注，非常严肃地思考着战争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恶果，其中交织着对人的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关注，对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生命遭到无情践踏表示极大的痛惜。这一切都表明王思玷是一个严肃的直面人生的作家，是一个有着可贵的人文关怀的作家。

打开王思玷的小说，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难怪有的文学史家喜欢把他和20年代中期的“乡土作家”相提并论。然而他比“乡土文学”作家如许杰、台静农、王任叔等人起步更早，在20年代初期就创作出了颇具“乡土文学”色彩的《风雨之下》、《偏枯》、《归来》等小说。

如果说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山鼻祖，王思玷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思玷也不愧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先驱者。王思玷小说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和语言特色上，如鲁南元宵节造面灯的习俗，阴历五月十三早起向关帝庙跪着求雨的习俗等等，鲜活展现了鲁南农村所特有的地

方色彩。王思玷的小说还充分运用了鲁南地区的方言,使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活跃的生命力。

鲁南最著名的文化古镇兰陵,是闻名海内外的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挚爱的故乡。王鼎钧先生少小离家,辗转台湾、美国,然而,不论他走得多远,他始终心系故乡;故乡兰陵,始终是他心中和笔下最美的景致,最清晰的梦。在离开故乡的半个多世纪里,王鼎钧一直执著地认为,故乡兰陵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地方。他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描述故乡。兰陵古镇就是作家童年的天堂。故乡兰陵之美,不仅美在山川绿树,古城家屋,更美在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兰陵古城,兰陵的青青芥麦,甚至兰陵的风中,都浸透了醇厚的人文韵味,书香并着酒香,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兰陵人。兰陵人热爱诗歌、散文、书法,崇尚文化道德,既坚忍入世,又明白畅达,敏于接受新思想。兰陵人几乎都有一种文化的自觉,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训练,并郑重地传诸子孙。王鼎钧在幼年时代,就接受了来自父母、老师、乡人全方位的儒家文化影响,忠厚待人、孝心、责任心、民本思想、忧患意识、民族大义、积极入世等儒家文化的精华,都点点滴滴地进入了少年王鼎钧的精神世界,并在他的心灵图景上沉淀为一份永难磨灭的人生底色,在他未来的人生及创作中,逐渐显露出来。

1925年,王鼎钧出生于兰陵。他的祖父是个能干的商人,经营酒厂及酒店。其父国学根基深厚,受过新式教育,在济南读政法专门学校,母亲是位善良的基督徒。兰陵人热爱国学,重视子弟的教育,但决不保守,深有远见的族人纷纷将子弟送出去接受新式教育。受过新式教育的子弟才俊回到家乡办学,将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古镇,开阔了家乡子弟的视界。王鼎钧就读的兰陵县立小学就是这样一所由孔庙改成的新式学校。大老师王思璞是王鼎钧敬佩的人。王老师特立独行,有反抗世俗的精神,曾在家乡倡导新式婚礼。王老师同情、尊重并且注意提携穷苦而又肯奋斗的人。从孔

孟的仁爱与释家的悲悯出发,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儒家释家都空有理想,只有共产党能够付诸实行。王老师是王鼎钧的人生楷模,在立世为文为人等方面给予王鼎钧极为深刻的影响。教国文的苏老师欣赏王鼎钧的文才,特意将夏丏尊先生专为中学生写的书《文心》给他看,小学生王鼎钧一口气读完,非常喜欢,并在心里有了对于自己的深深期许——将来做个夏丏尊。后来王鼎钧写了《文路》、《讲理》、《文学种籽》等一系列指导青年写作的书,应当是对于自己少年愿望的实践。

离开家乡,少年王鼎钧的心中无时不在思念父母故家。流亡中学的少年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还乡梦即将成真,却被战争之手无情地推动着,虽日行千里,却与家乡兰陵的距离越来越远。台湾与大陆虽盈盈一水,但政治阻隔,有家难还。故乡,自此成为作家心头一份难以释解的隐痛。从1949年渡海到台湾,至1978年赴美工作,定居纽约,大约30年的时间,王鼎钧在台湾度过了他的青年和壮年。对于王鼎钧而言,台湾时期是其人生与创作的重要时期,他在台湾步入文坛,以其创作实绩在台湾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名满台岛,成为台湾文坛的巨擘。

总起来看,王鼎钧在台湾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为生存的写作时期;为自己而艺术时期。为生存的写作时期大约涵盖了王鼎钧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的生活与创作。这一时期,因为家庭的重担、物质的逼迫,以及现实政治因素即国民党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专制政策等原因,他常年遭受自我心灵的压抑与萎缩的煎熬。

70年代起,王鼎钧开始摆脱种种羁绊,为自己而艺术。重要作品有:散文集《情人眼》、《碎琉璃》。

《情人眼》是王鼎钧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心痛与欣喜是《情人眼》的两大主题情感。作者在散文中表达了对传统与时代的某种价值观念的质疑。在《情人眼》中,人生的痛感多种多样:

“失家”的疼痛，“失爱”的疼痛，“自我”的疼痛，游移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现实与回忆之间，异乡与故乡之间，梦幻与清醒之间，这种“我非我”的痛苦有时会演变为令人绝望的焦虑和恐惧。在众多篇什中，王鼎钧郁积心中多年的痛苦得到释解，升华为对于大众百姓的悲悯与关怀。由此出发，《情人眼》沉郁悲凉的氛围里，也展示了人性、人生、自然的美好与亮丽，传达了作家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信心与欣喜。《情人眼》是作家生命中的一段重要历程，宣泄痛苦、释解痛苦、升华痛苦的过程。

1975年至1976年，王鼎钧连续出版《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三个励志小品集，合称“人生三书”。“人生三书”，令他名满台岛。《开放的人生》专为青少年而写，偏重做人的基本修养，以开放的态度，探索剖析人生问题，咀嚼、消化人生经验，以使青少年保持开阔的视野，坦荡的心胸，坚定的信念，充实的生命。《人生试金石》偏重青年离开家庭之后的阅历，帮助青少年破生存之谜，圆成功之梦，提供人生注解，熔铸完美的人格。《我们现代人》教导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青年人，以新态度来处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积极参与现代社会，拥抱现代人生，做一个成功而又快乐的现代人。“人生三书”的文体，属于励志小品类，文简意丰。“三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书坊间的畅销书与常销书，销量上百万册。通过“人生三书”，王鼎钧的人生观，深深地影响、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

“人生三书”的成功，了结了王鼎钧郁结心中多年的心愿，完成了一个“社会人”的责任。而《碎琉璃》应看作是他寻找自我的心灵工程。《碎琉璃》初版于1978年，是王鼎钧写作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在对于故乡的回忆中，作家的的心灵获得了春雨般温柔绵密的滋润，由躁动而归于宁静，从容细致地经营出一片寓厚重于轻灵，瑰丽而不炽目的散文美景。

1980年，王鼎钧定居美国纽约。写作不辍，文笔越来越老辣，

人生的睿智与畅达尽得展现。赴美后有作品 20 种。其中,《左心房旋涡》、《昨天的云》、《随缘破密》、《心灵与宗教信仰》等书广受关注与好评。定居美国后,置身异国他乡,王鼎钧的心灵与创作又经受了一次来自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这份撞击,一方面强化了他的乡愁,促使他进一步探索他这代中国人漂泊流离的命运,思索国家文化传统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对人生的探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展开,并逐渐延伸到人性的层面。最后,家国命运与人性探索连接起来,互为关联,息息相通,完成了一个关于个人修养与社会文化的重大课题。这是王鼎钧对于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贡献。

即使离开家乡已千里万里,即使年逾古稀,故乡兰陵永远是作家王鼎钧心中一个千回百转的情结。

王鼎钧先生的散文回忆录《昨天的云》,是其在大陆出版的第 3 本散文集。这是一本反观人生早年之旅的书,作者坦言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日本侵华期间山东沦陷,他离家成流亡学生,辗转数省,后漂泊到台湾,晚年赴美。人生沧桑,世事飘零,化作故土之念、家国之思。

作者用大量篇幅忆叙了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和覆巢之痛,背井离乡之苦,描绘了所经受的血与火的洗礼和家乡父老奋起抗日的种种情状。这是作者永不释怀的个人、家庭、祖国的苦难史,在这个晦暗、阴郁的底色上,一个生命个体的心灵史、情感史、精神成长史鲜明地凸现出来,作者的人生历程在新旧、古今、中外的碰撞、冲突、融合中接续、传承了虽经劫难而愈发焕发强劲生命力的文化命脉,漂洋过海之后,这条文化命脉对其生命的维系更加紧密,使他的散文散发出浓郁的文化乡愁,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兰陵是史书中的常见字,作家的家乡人杰地灵,汉朝时的太傅疏广、他的侄子少傅疏受轻财尚义,是作者少年时期的偶像,给大儒荀子提供书房是兰陵这个小镇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李白赞誉兰陵美酒的那首七言绝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使兰陵酒声名远播。自乾隆以下,兰陵王氏出了五位进士,进士衍公,书法一绝,乡邻几乎都收藏他的手迹并悉心临摹。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氛围自小在作者的心灵中播下了历史文化的种子,等到上小学时,几位大学毕业回乡兴办新式教育的贤士仁人开风气之先,革故鼎新,“拿来主义”办学,引进了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安徒生童话、《阿 Q 正传》、《资本论》、《万有文库》等等,这些精神食粮滋养了王鼎钧幼小的文学心田,特别是荆石老师的悉心指导,使这棵“文学小草”在破土萌芽之际就以自然、质朴的风貌把根深扎在这方土地上。

《昨天的云》中,疯爷是一个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难以定位、归类的形象,他是进士衍公的爱子,身处乱世,沉溺于酒中不能自拔,胡言乱语,效古人佯狂避祸。作者有幸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修习书法、唐诗,深得真传,而他到族中巨室访求进士衍公遗墨揣摩之、抄录之,更使他书法精进。《昨天的云》一书封面、封底书法就是作者亲笔手书,笔法飘逸、俊美而有风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风韵在这点、抹、挑、勾之间维系着海外游子的思乡情怀。作者辞别疯爷时写诗纪行:

一代书香共酒香,
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斤鼎,
乱世文章九转肠。
盏底风波问醒醉,
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
回首凝望柳几行。

在王鼎钧颠沛流离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抚慰了他的心灵,给他的生命镀上了亮色。一位是 본家五姑,青春貌美的小学同学,她

是小男孩心中的女神和歌仙，她的歌“是母校的一种绝响”。另一位是云雀般的表姐，她的出现使作者平添了一种新的看待周围人事的眼光，灵动、明快而欣喜。她给他带来了《家》、《子夜》、《从文自传》等新文学作品。五姑伴着“红球”（太阳）现出来，“二姐，踩着彩虹走来”，“红球”和“彩虹”两个意象都是绚丽的、光彩照人的。而作者的母亲以她的坚韧、智慧、爱心、信仰使他受益终生。

《昨天的云》是作者在与生命对话、与情义对话、与故乡对话，这是穿越数十年的漫长的过程，在无数次情真意切的对话中，作者的心灵、情感无数次穿越遥远的时空，盘旋在故乡的天空中。这种对话因之而境界阔大、意蕴丰厚，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和剪不断的缕缕情丝。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王鼎钧用活泼的形式，浅近、朴实的语言，表达深远的寄托，字里行间有种质朴的诗意，笔法舒放自如中尽显驾御语言的深厚功力，呈现一派大家气象。

如果说王鼎钧的创作接续的是鲁南文化的命脉，虽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那么，贺敬之的诗歌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这个鲁南之子代表鲁南人民发出了政治解放的喜悦心声。这两个层面其实是相辅相成、无法割裂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诗歌创作的历史主题，以致建国后至 70 年代末，表现社会普遍的政治情绪成为相当长时期内的诗歌潮流，而题材和视角的政治化倾向使政治抒情诗成为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代表诗体。在 60 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贺敬之、郭小川是两位最优秀的诗人。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诗作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性、政治性，是对“诗言志”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这些轰动一时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研究贺敬之的诗歌一定要将之置于“17 年诗歌”的历史框架内，还原其在文学史及美学价值上的真实地位。

1949年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出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对文学创作来说,同样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新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得时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先进的世界观透视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以共产主义的理想点燃创作的激情,由衷地开始了新时代的颂歌。

以贺敬之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自愿成为“时代精神单纯的号筒”和“权威发布人”,唱出了一个个时代最强的音符。时代生活特征与作家主体创造特征的同一体性、一致性,使他的诗无论是题材、内容、抒情主体的精神,都与整个时代融为一体,因而一度产生过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政治抒情诗在生机勃勃的新时代上空长久地回旋着。

在中国,由于民族历史生活、历史命运的特殊性,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文化环境中人的个体和群体文化选择的特殊性,我们无法轻易地从“社会政治”中逃离,但也不能把政治抒情诗与颂歌简单地画等号,认为政治抒情诗就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歌功颂德,对政治、历史完全肯定、认同,没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深刻的思索。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作为一种艺术上的求索,政治抒情诗毕竟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品格提供了一种生成的可能,它肯定和强化了当代诗人关注土地、社会、人民的天职,留下了社会政治进程和沿革的轨迹,保存了一代人难以忘却的精神记忆,提供了独特的构思方式和抒情方式。作为当代新诗创作的一种“文化现象”,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政治抒情诗曾哺育和影响过饮誉国内外的几代诗人,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贺敬之的创作道路,是一条求生、求学、求光明的坎坷之路,他是在革命战士和诗人双重身份中成熟起来的,在他身上体现着革命战士和诗人的统一、政治生命与艺术生命融为一体的重要特征。他的诗歌创作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血肉相连,因而他的诗歌创作道路可以说是一条革命诗人成长的光荣历程。

对于贺敬之的人生之路与创作道路,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贺敬之诗歌的“意识形态化”使其诗偏离了纯正诗学的轨道,成为政治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意味着“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完全失落。虽然历史上各有各的说法,但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思想和艺术时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作品出发,既不人为拔高,也不歪曲事实或作虚无主义的否定。

贺敬之几十年的诗歌创作道路一直与祖国解放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轨迹紧紧相连。他出身贫苦,少年时期即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诗立足于现实生活,走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诗人对劳动人民的讴歌热情而真挚,为平民百姓代言的抒情朴实而深沉。经过革命实践的洗礼,贺敬之不断认同能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社会思想、政治观念,社会主义理想渗入诗人的潜意识,成为诗人内在的精神追求。在新中国到来之际,作为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诗人、战士,贺敬之抑制不住汹涌澎湃的激情而放声歌唱,有了新旧社会生活的对比,诗人歌颂时代的愿望自由地转化为意象的血肉,构筑成一首首气势磅礴的政治抒情诗,其诗所表现、讴歌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内容,直到现在仍然为国家、民众所需。

贺敬之 20 世纪 50 年代至新时期的诗可分为两部分:一类是抒情短诗,或曰生活抒情诗,这些诗是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他对某些事物的感受,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民歌和古诗的韵味浓厚,如《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另一类是用改造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写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这类诗以热情高亢的情感抒发时代情绪,抒写诗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如《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

作为“时代情绪的晴雨表”,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时代特征是

历史赋予的,也是诗人内在情绪和心理情结外化后的必然显现,是政治文化的时代回声。就前者而言,1949~1976年间中国主流文学的政治文化倾向与权力话语的直接操纵有着根本的因果联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有了最权威最准确的界定。就后者而言,贺敬之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实现个体生存价值的途径——通过对政治理想的审美表现来达到社会政治伦理的终极目标。

贺敬之诗歌的时代特征首先表现在:诗人有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和敏锐的政治目光,反映时代情绪和时代声音成为他创作手冊上的第一原则。他紧紧跟随时代,在诗歌的创作题材上,恪守时代命题的规范,表现出时事性、重大性的特点,在抒情短章这类作品中,虽然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活的新变化,建设中的新发展,但其中响彻了对领袖、政权、人民热情歌颂的主调。

他的政治抒情诗继承了浪漫主义的诗学遗产,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主观性、空想性的特点。激情充沛、粗犷豪放是第一代政治抒情诗的鲜明特征,创作手法的豪放化使得诗歌表现出或崇高或壮美的美学风格。贺敬之的诗歌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追求与时代相吻合的艺术风格,其抒情风格也是激昂慷慨、豪迈奔放、大胆热烈、高亢雄壮的,非常适合朗诵。其抒情个性与哀怨低沉绝缘,与纤细缠绵格格不入。

基于对个体、群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充分认识,贺敬之的诗既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又是他个人的歌唱,既是党和人民激情的火一样迸发,又是他豪放不羁个性的淋漓尽致的表现。正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贺敬之才可以“一览众山小”,他的诗才可能有宏大的气魄、绚丽的色彩、磅礴大气的抒情风格。

贺敬之的诗在诗歌形式上发展、创造了民歌体、半格律体、“楼梯式”、“凸凹体”等新诗形式,无疑具有浓厚的民间语言风格和大众化的欣赏口味。在诗歌从“贵族化”转向“大众化”的运动中做出